

第四節 教授的苦難

四年多來中共爲了積極建立極權教育體系的目標下，曾進行了學制的變更，迭次的院系調整和課程改革，一連串的洗腦與思想改造。現在各大學不獨面目全非，根本上就是道地的俄式學校了。

雷厲風行的思想改造運動起於一九五一年的秋天。從這時起所謂「權威教授」，「國際學者」，被痛罵爲「東抄西抄，粗製濫造」。接着便掀起羣衆性的思想改造的鬥爭。先強迫學習「新觀點，新思想，新方法」，繼批判「舊觀點，舊思想，舊方法」。同時強迫認清「敵我界線」，劃分「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思想界線」。目的是使教授們具有階級仇恨的觀念，改變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思想。

教授講師被迫思想改造，也是有步驟的。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出版的「教師學習」載：「京津參加學習人數已由三千餘人增至六千五百二十三人。第一階段學習周恩來關於智識份子思想改造問題的報告。以立場、態度、爲誰服務等問題爲重點，初步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第二階段學習彭真關於三大運動的一些問題的報告，着重揭發反動思想，劃清敵我界限，明確人民立場。第三階段學習胡喬木關於共產黨主義的報告及陳伯達關於毛澤東思想的報告。着重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觀念。明確工人階級立場、觀點、方法，批判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

的錯誤思想。第四階段學習李富春關於經濟建設和培養幹部問題的報告，着重樹立教育爲國防和經濟建設服務的思想，結合學校教育工作（院系調整、課程改革，教學方法）中的思想問題，作爲進一步改革高等教育的準備。第五階段，總結——個人思想總結，檢查工作，擬定改革高等教育和改進工作的具體辦法，由錢俊瑞作總結報告。

思想改造是改革教育的重要關鍵，也是重要的政治任務。中共中南區教育部長潘梓年說：「思想改造運動是一個嚴重的政治任務，是一個必須貫徹執行的法令，決不能願意參加就參加，不願意參加可以自便。當然思想改造是一個嚴重的政治任務，是一個必須貫徹執行的法令，決不能願意參加就參加，不願意參加可以自便。當然思想改造是

應在自覺自願的基礎上進行，而不是強迫命令，可是革命形勢的飛躍進展，誰再不『自覺自願』就得掉隊，趕不上歷史的進程了」（見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四日長江日報）。

思想改造不單是一個法令，根本是一個「聖旨」，而且是史達林命令毛澤東提前結束中共的「人民民主專政」轉變爲蘇維埃化的一黨專政的「聖旨」。毛澤東及其部下的頭目，自然只有奉命唯謹，高叫革命形勢的飛躍進展了

⑨。

在思想改造運動中，共產黨徒用槍桿刺刀對正教授講師們的背後說：「快修正錯誤，快劃清敵我界限，快劃清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思想界限。」他們在淫威之下，批判了舊的一切，接受了馬，恩，列，史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真理」。他們所追求到的「真理」是什麼？是赤化世界，把地球造成人類的墳場。他們所要修正的錯誤是什麼？是否認人權，否認人生的尊嚴的價值。他們所要劃分的「敵我」以及「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又是什麼意思？那是要把全人類造成仇恨，造成敵對，使彼此之間互相鬥爭，互相殘殺，在這種仇恨與殘殺中來鞏固它底赤色政權。教授講師們明知這是毀滅的路，但懼於緊指在脊背後的槍桿和刺刀，只好任人牽着鼻子擺佈了。且看一些教授學人的哀怨和呻吟：

周谷城是「解放」後上海復旦大學教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又是實際負責校務的紅人。但在「三反」中仍得自我檢討、坦白一番，茲摘錄他在全校師生員工大會上檢討詞如次：

「①我有極深的官僚主義作風、②我具有極濃厚的封建主義思想和小資產階級意識的清高的想法，我認為我已經成名了，解放後我可以退休而專事寫作了，這是違反人民的意志的，不可饒恕的罪行。③我是一個個人英雄主義者，想成名，想依靠成名來提高我的地位和身價，因而忽視了廣大的人民和他的力量。④浪費國家資財。」

王家楫是一個舊學根底很好的科學家，從一九三四年起進入中央研究院，一直到「解放」前，在中央研究院工作了整整十五年。一九四九年底，中國科學院，把以前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等機構，重新調整。王家楫被指定擔任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長。他對於他的原生動物學不被重視，鬧了很久的情緒，但有什麼用呢？他被指定作了這次的劇烈的思想鬥爭，然後又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批判我的思想」的文章，他說：

「我是一個科學工作者，完全是由舊社會裡教養出來的人，過去關在實驗室裡，自命『清高』。現在回來仔細檢查一下，覺得以前所犯的錯誤，實在太多，差不多一般小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所容易犯的毛病，我沒有一樣沒有犯過……。

「從前我是不習慣於集體生活，怕組織，怕紀律。在中央研究院十五年真是適合我的胃口，做了反動政府當點綴用的一隻花瓶……中央研究院每逢舉行評議會，假如沒有胡適之來出席，就覺得掃興。若能够同胡適之多握幾秒鐘手，多談幾句話，就會覺得體面。……」

「過去的缺點和錯誤是說不盡的，但我們如果能虛心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接受無產階級的領導，積極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改變舊的態度，革除舊的作風。我想每一個科學工作者，都有可能成為人民的一個勤務員。」

周培源是清華大學的教務長，是國際間都有成就的物理學家。三反之後，他感到如果不無條件投降，共黨的刺刀難免要落在他頭上，於是便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一篇「批判我的資產階級的腐朽思想」，歷數自己所犯的過

錯，一開頭便說：

「偉大的三反運動，使我有勇氣正視我過去所犯的嚴重錯誤。我一向利用『專家』、『學者』的地位往上爬，做了反動政府的點綴品，甚至發展到替反動政府做義務宣傳。我的崇美、親美思想，使我在抗日戰爭時期，喪失了民族立場，投到美帝懷抱；在科學技術上，成爲美帝侵畧世界和平人民的幫兇工具。三反運動使我願意撕下了我的假面具，暴露我的醜惡面貌，在羣衆面前承認了我的錯誤，批判我的資產階級腐朽思想，清洗美帝文化侵畧給我的餘毒，下了決心重新做人。……

「我的唯武器論和工業救國論，是完全替反動派辯護……我勸告青年學生不做學生運動，對不起當時參加革命工作的同學們，也對不起人民。……我加入了美國軍事科學研究工作，是做了美帝的工具，我要控訴我自己，控訴我這個喪失人民立場，甘心爲美國劊子手作幫兇的所謂科學工作者。……我千方百計阻止我第二個女兒成爲一革命幹部，要她中學畢業進大學，爲了阻止她參軍，我採取了極卑鄙的手段，她的熱愛革命和我的抗拒革命是一個鮮明的對比。我阻止她參軍的惡劣行爲，是違反人民利益的。

「我感謝黨，感謝毛主席，黨教育了我，使我認識光明。我已下了決心，把我思想中存在的資產階級留下的一切污毒清洗乾淨，堅決服從組織分配，爲人民服務。」^⑩

錢偉長是清華大學的副教務長兼機械工程系教授。他是一個刻苦奮鬥的苦學生，但後來考取了公費，在加拿大苦讀，他的論文曾受到國際力學界的注意。他曾在美國研究火箭炮和噴射研究工作，一九四五年回到清華，在機械工程系教書。一九五一年三月間，一個月內，他被指定作了四次檢討，他們認爲還不够坦白，四月十八日的光明日報上，他又寫了一篇「我跳出帝國主義陷阱」的自白書，說：

「在這個月內（按即三月份），我會做過三次檢討，但都不深刻，只覺得一身都是錯，……我根本沒有認識到自己的醜惡與工作上所犯的嚴重錯誤，因此初步向同志們作自我檢討時，是口氣輕鬆，滿不在乎，就是羅

列一些事實，找些藉口，想敷衍過去。我這種態度當然使同志們非常失望，當同志們嚴厲的向我提出了許多意見之後，我感動到無地自容。……

「由於我長期受到了美國式資產階級教育的影響，使我盲目的崇拜資產階級的國際標準。而不會了解新中國的科學技術正在蓬蓬勃勃地成長着，由於工人階級的智慧和創造，我們的技術便一定有無限的前途。……

「我在工作裡表現了自高自大，自認為進步，自認為有學問，自認為有辦法。但是在同志們無情而嚴酷的批判下，我初次知道了過去的醜態和危害性。三反運動給我洗了一個澡，使我認識了恩人毛主席。感謝他和黨的指導，使我從四十年來陷於美帝陷阱裡跳了出來。」

葛庭燧從一九四二年到日本投降這一期間，都在美國參加軍事研究的工作，他在特別的機構中，從事雷達和原子弹的研究。一九四五年以後，他又受芝加哥大學的邀請，在該校的金屬研究所致力金屬強度的基本研究。一九四八年回到清華大學，擔任物理系教授。「解放」後，中共成立了一個中國科學院，他又擔任了應用物理研究院的研究員。葛庭燧每次作仇美反美言論時，由於他習慣地，忠實地，不肯作違心之論，他曾被反覆坦白了若干次。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共幹指導下，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批判我的崇美思想」。他說：

「過去我對於美國的科學和技術，只是從表面上來看，並沒有仔細分析，牠究竟是掌握在誰的手裡？我只強調過去美國科學技術成就，而沒有看清它正如同帝國主義的命運一樣，已經急劇地走向衰亡和毀滅的道路，由於我盲目地推崇美帝的科學技術，所以在不知不覺中有了崇美的思想。因為我在美國八九年來所作的科學研究工作，使我不知覺之中，產生了追懷和留戀過去的思想，不但隨時要替我自己在美國所作的科學技術研究工作辯護，也要替我在美國所參加過的學校和研究機關辯護，再推而廣之，甚至替美國的一切辯護。在抗美援朝運動中，我對於宣傳和增產捐獻等工作都會積極參加。但在追溯美帝侵畧我國歷史的時候，我却認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候，美帝曾和我們共同打擊日本。我雖深切仇恨現在的『美帝』，但我却並不怎樣仇恨在第二次世

界大戰時期的『美帝』。爲了辯護我的這種態度，我曾經強調我在美國時，所聽到許多關於美帝反法西斯行動的誇大宣傳，其實這是百分之百的親美思想！

「原子彈和雷達的發明，只是美帝用來威脅人類，作原子訛詐的資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蘇聯遵照約定出兵攻擊日本的前夕，美帝竟使用原子彈來屠殺無辜的日本平民，這對於反法西斯戰爭來說，是完全沒有必要的。」

現在我深刻體會到我們新民主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只要我們的科學技術工作者能够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方法，我們的科學和技術就必然會隨着我們國家的工業建設而突飛猛進。」

梁思成是梁啓超的兒子，中國有數的營造學專家。他在美國專攻建築，回國後首先在東北大學創辦全國第一個建築系。中國各大學後來有建築這一門功課，可以說全是梁思成的努力。他離開東大以後，創立了一個中國營造學社，以後十五年中，他一直致力於這一個學社的發展，調查實物，考證年代，着手編一部有實物爲證的中國建築史。他又是中央研究院的通訊研究員，抗戰末期「戰區文物保管委員會」的副主任委員，「聯合國新廈設計團」的中國代表。北平「解放」時，他是清華大學的營建系主任。自從「解放」後，「訪問」、「檢討」、「坦白」就一直不斷的「照顧」着他。在重重的壓迫下，使他不得不有所表示。於是在一九五一年的年底，他寫了一篇「檢討」的文章來「交賬」，冀圖「苟安一時」。他說：

「我的階級出身，家庭環境和所受的教育，給我種下了兩種主要思想根源。一種是我的父親（梁啓超）的保守改良主義思想和熱烈尊崇本國舊傳統的思想。一種是進了清華學校又到美國留學，發展到回國後仍隨着美國「文化思潮」起落的崇美、親美的思想。」

「我雖然只做過教學和學術研究工作，但由於這兩種思想的發展，我在二十餘年中，一方面走到統治集團的外圍，成了可供他們驅使的工具，另一方面，我又接近了美帝國主義侵畧中國的『文化人』，被敵人拉攏，

爲他們的侵略政策服務。前者證明我有根深蒂固的正統觀念，不是「超政治」的，而是在行動上一直擁護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反動的政府的，也就是維持自己階級利益的。後者證明美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政策是毒辣的，它對我起了麻痺作用，使我養成了崇美思想而不自知：我的純技術觀點又恰恰是給了敵人以可乘之隙。

「……當時的北京是帝國主義文化間諜的樂園，懂英文的中國學者正是他們工作的對象。營造學社的經費主要部分是依靠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和中英庚款董事會的補助，營造學社研究的成績安得不受到買辦董事們和各國文化間諜的注意？最初，他們以北平美術社的名義拉我去做英語的學術演講，更進而辦有英語說明的展覽會。他們覬覦着我們的照片、圖像和文獻考證資料。……今天回首往事，事實明明白白的擺在這裡：如果中國的主權沒有保障，這種向帝國主義匪盜講解我國文物精華的行爲，只是開門揖盜，只會引起帝國主義對我國人民更殘暴的掠奪。我歸根是爲他們服務的。但當時我看不見這一點。

「抗日戰爭初起，我爲了抵制日本帝國主義的『文化合作』，將北京的營造學社結束，把帶不走的資料存放起來，自遷到西南。當時我認爲這是愛國的民族意識的表現。但此後却自願地接近了美帝國主義份子；發展到後來，竟喪失了立場，以敵爲友，正是崇美思想的結果。

「勝利以後……美帝普林斯頓大學成立二百週年紀念時，我被請去參加學術討論會，也以爲是『躬逢其盛』，十分體面。我在那次會議中還被贈授名譽學位。這個學術討論會的專家之一，正是研究『遠東問題』，也就是討論關於中國各方面的問題，如中國社會結構、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等等，研究如何侵畧『遠東』。而當時的我呢？麻痺症的加劇正和我在美國所受到的『親切』和『榮譽』成了正比例！回想當時的崇美情感，真令人吃驚。

「另一件事也同樣說明崇美思想如何支配着我的行動。當一九四六年營造學社無法繼續，清華大學向我接洽創辦營建系以後，我就覺得要再出國去深造一番。我對自己十餘年的經驗失了自信心，而去搬運新教條，

結果我便把各流派建築理論新書，和『抽象圖案』之類的唯心藝術理論全部販運過來，毒害學生。

「總而言之，我曾一方面把祖國文化的精華盡量拿去向敵人吹噓，一方面把敵人的糟粕——同雅片煙一樣的麻醉劑——運回來毒害我們下一代的建築師。」

李方訓是一個標準的「金大人」，他在金大畢業後就由母校送出國，留學回來又在金大做教員，一直到「解放」前整整有三十三年。「解放」後金大校長陳裕光雖儘量靠攏，終無法避免清算的命運。一九五二年二月間，就由「金大老人」李方訓作校委會的主任委員。李在中共的標準看來，是一個切切實實的「美國奴才」，他過去的言行，完全可以證明。要他負責校委會，不過是一個幌子。茲抄錄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南京新華日報上所載李方訓的自白詞一段如次：

「我從前一切崇拜美國，處處仰承『美帝』的意旨。……日本投降時，我瘋狂的崇拜原子弹，並還作了四句詩——『寧知天德屬同盟，原子功當百萬兵，驚得倭奴齊解甲，九洲萬國慶昇平』。吹噓原子弹，迷信美國，抹煞共產黨領導的抗日力量，抹煞蘇聯消滅日本關東主力軍所起決定勝負的作用。……我一貫做『美帝』的工具，進行美國文化侵略。思想上是『美國第一』，工作上仰承『美帝』意旨，唯命是聽。到解放後我的思想仍未解放。一直到第二年我到北京，政府首長宣佈接管金大，負擔全部經費（鬼話），而且只准辦好，不許辦壞，再三教育我，我才認識到過去是站在美國文化租界上。執行其文化侵略任務，毒害青年。

「我因為親美，崇美，恐美，也就仇視蘇聯，認為蘇聯是赤色帝國主義。三年來中國人民在蘇聯老大哥的幫助下，生產建設突飛猛進，我才意識到我過去『敵友不分』。」

「總之，由於我嚴重的重視個人利益，所以親美崇美。更由於我出身封建家庭，受帝國主義教育，因此反蘇反共反人民。從小就想留學向上爬，喪失民族立場。

「我思想上最搞不通的一個問題，就要算民主集中制了。「解放」後，我對選舉制度老是搞不通，為什麼

選舉幾個人，提名時也就只提幾個人，提名至少應當加一倍呀！人民會議的代表不經選舉我也不懂，這怎未能叫民主呢？鎮壓反革命運動以後，我才恍然大悟。」

陳垣是三個時代的人物，北洋時代做過國會議員，教育部次長，國民政府時代他一直就是輔大校長，解放後他宣佈思想已在痛苦中搞通了，繼續做紅色輔大校長。茲摘錄一段這位老人在「欽定」的「檢討」裡的坦白詞：

「我研究歷史，不但立場，觀點，方法是錯誤的，而且因爲我『已想『不問政治』，想『脫離政治』，所以不很研究近代史，因爲近代史與當時政治關係密切，牽涉太多，因此對於近百年國際和國內的變化，完全認不清。認不清中國社會的性質。當然也認不清帝國主義的侵畧本質……有這樣一個錯誤的看法，所以我就『自以爲是』的甘心作帝國主義的傀儡。」

「我爲了自己好名，爲了自己的『清高』，爲了不願沾染當時的政治氣氛，就毅然離開政治舞台，自以爲是找到了一理想的棲身之所，而實際毫沒有『人民立場』，『喪失』了民族氣節，馴順安適的投到帝國主義的懷抱。二十三年來作了帝國主義的俘虜，忠實的替帝國主義奴役和麻醉青年，帝國主義者就通過我，穩紮穩打地在學校裡做『太上皇』。」

「二十三年來，通過我給青年們，灌輸奴役教育，培養出爲他們服務的人才，貽誤了多少青年子弟，還以爲『超階級』、『超政治』、還自以爲『清高』，其實就是做了幾十年污濁、卑鄙的買辦和幫兇而不自覺。」

金岳霖是清華大學文學院的院長兼哲學系教授，他是唯心論的權威學者。他從十九歲起就在外國，一直住了十一年。他三十多年來，都在潛心研究哲學——唯心論的哲學。共產黨人對於他自然認爲是澈頭澈尾的「資產階級」、「特產階級」、以及具有深厚的「反動思想」。尤其是他對於共產黨和蘇聯的看法之錯誤。和其他的許多

學人一樣被指定自我坦白。茲摘其中一部坦白詞如次：⑫

「我是個自由主義者，我的一切政治態度都根據於這一個觀念。對於美帝國主義的態度：由於我在美國留學多年……認識了很多美國人，常同他們往來……一九四三年美國國務院請中國一些教授去美國，我也是其中之一。我曾在美國國務院，要求美政府幫忙中國，實行民主，我的崇美思想，『竟使我喪失了民族立場』。

「對蘇聯的態度：我以『舊』的民主主義的觀念去看蘇聯，直到『解放』時為止，我還認為蘇聯根本不容許個人自由。我認為十月革命與以後的清黨都太過火。還認為蘇聯經常對各國共產黨的內政加以干涉。

「對於學運的態度：在我的教學生活中，有很多次的學生運動。我對學運的態度十之八九是消極的，兩面性的。一方面我不景仰國民黨，另一方面我又反對共產黨。……

「對『解放軍』與共產黨初步的認識：『解放軍』的『奇蹟』使我衷心佩服，它的軍紀之『好』是空前的，它『愛護人民』，更是我所『意想不到』的事。……

「以概念分析的方式去講馬列主義，這實在就是以唯心的形而上學的方式去講授馬克斯列寧主義？……以這種方式去講馬克斯列寧主義，其結果是歪曲了馬列主義。馬列主義本來是具體的、戰鬥的、行動的指南，而在我們手裡却變成了沒有生氣的，抽象的，概念的堆積。……

「哲學系的任務，基本上是培養宣傳馬克斯列寧主義的幹部，可是在系內資產階級的唯心哲學和學風仍然佔着統治的地位，這就使任務不能完成……我是要負責的。

「直到三反運動，我才開始認識了我自己過去的面貌和我身上所背的自私自利的蝸牛殼。……我現在要打碎我的蝸牛殼，肅清多年來支配我生活的資產階級腐朽思想。

「我不願意只參觀革命，也不願只參觀人民的建設事業。我要參加這光榮偉大的事業。不但一二十歲的人

要參加，三四十歲的人要參加，五六十歲和七八十歲的人也要參加。我快六十歲了，我從前是對不住人民的，是有罪過的人，從現在起要作一個新人。……」

黃念田是四川大學中文系的副教授，他是狂放不羈，向來達觀，常抱遊戲人間態度的「名士派」。「解放」後，他雖曾加入工會，並發表過一篇「八個月來我的思想鬥爭」，以期苟全。不料共產黨一直找他的麻煩。三反運動時，共產黨又看中了他，要他再「檢討」一番。於是他含着滿腔眼淚，笑着說：

「我的眼光只看到個人的利益，家庭的幸福，我『兒女情長，英雄氣短』。『解放』前，我只想『苟全性命於亂世』，『全軀保妻子』，根本不知道什麼叫人民的疾苦。對中國的革命問題，更是熟視無覩。我同我妻子感情很好，結婚二十年從來沒離開過。我兒女七八個越多越愛。『解放』前，我常對我愛人說：『活着，就是爲孩子』。我單求溫飽，並無大志……我完全靠一張聘書生活；有它，就有錢，就有飯吃，沒有它便一切都是爲孩子』。我單求溫飽，並無大志……我完全靠一張聘書生活；有它，就有錢，就有飯吃，沒有它便一切都完了。……因此，我腦筋裡終日所盤旋的是聘書、飯碗、鐘點費、稿費，說來說去歸根到底是一個「錢」字。也便是資產階級的拜金主義。

「我的人生觀是消極頹廢的，表面上似乎是達觀，實際上是極度悲觀。於是產生一種『人生如夢』的看法。我認爲：既是夢，就不必認真，不必奔競，活一天就該圖一天快活，這樣就產生一種享樂思想。我的享樂……只是『閉門却掃，焚香讀書』；『左顧孺人，右弄稚子』；『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多看電影，少交朋友』而已！我把世界當成客棧，常抱着遊戲人間的態度。我又認爲人生不過是一場戲，要演成喜劇，又何必演成悲劇呢？……而本質上便是極端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

爲了篇幅的關係，只摘錄了上面十位教授的檢討坦白詞，他們爲了苟全性命而背棄了真理與事實、發表違心的言論、辱罵自己的過去——包括人格、行爲、以及數十年來研究的心血結晶、學術思想。降順於獨裁者之前。他們雖得暫保殘生，但却只贖殘魂枯骨，乞食於專制政權之下。甚至背棄了以往的一切，仍不能見信於統治者，終遭戮

殺的，亦不知幾許。至於爲着真理，堅持自己的思想與看法，不肯阿附共產黨專制與獨裁的學人專家，而今不是慷慨就義，便被關起送進勞動營作無期的改造了。

在思想改造運動以前，學者們雖已知道自己的自由已經完全被剝奪了，但多少總想保留一點讀書人的人格，依然極力掙扎不肯澈底投降，到了三反運動開始以後，毛澤東的刺刀向學術界進攻時，不特一切學人專家須無條件的投降悔過，就是所謂思想前進的靠攏份子，亦須重新「檢討」，坦白。宣佈自己的罪惡，才可邀得共產黨徒們的開恩苟活。今天在大陸的教授講師們，在極權統治下，匪諜的包圍之中，都成爲十足的傳聲筒了。

中共責罵以前許多留美的學者專家都是「美國奴才」，都是美帝的「工具」，一般都有濃厚的「親美」、「崇美」、「恐美」的思想。要他們悔過認罪。認識蘇聯才是真正的好朋友，只有蘇聯老大哥的幫助下，中國的生產建設才能突飛猛進。中共迫使學者們承認，「在毛澤東統治之下，什麼科學技術專長，可以由工人階級的智慧去創造，而不需要科學基礎」（按此語是中共黨徒們指導錢偉長這樣說的）。「只要科學技術工作者能够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方法，我們的科學和技術就必然會隨着我們國家的工業建設而突飛猛進」（按此語是中共黨徒們迫使葛庭燧這樣說的）。中共強迫一羣有卓越成就的科學家，否定科學基礎，並要他們以沒有頭腦的人也不會相信的「科學技術可以和馬列思想方法連在一起」的謬論，來教育學生。這是多麼的瘋狂統治。

今日在大陸的學人，雖然一個個從過去的皮到肉，從思想到日常生活行動，都澈底翻轉了，這已足夠悲哀殘酷的了。然而他們依然時刻就心着自己的命運好似風前燭，瓦上霜一般。因而言行小心，謹慎將事，在生命第一的前提下，一切只有仰承統治者的意志去混騙的了。因爲在那種環境之下，不容你談真理，言思想，講學術。爲的是目前是一個最黑暗的時期呀！^⑯

這裡引述一位上海某教會大學的教授，於院系合併後調配到東北長春大學教了半年書，然後回到上海在火車站角落裡的一段談話如次（見新聞天地第九年第十五號學府滄桑）：

「你怎樣會弄得像個癩三？」

「我剛從東北回來。在東北，大家好像不如此就無以表示積極。」

「那裡是示範的老解放區，那裡的學生一定比上海的學生前進得多吧？」

「天曉得，不過五十步一百步的分別，搗鬼也總是這幾個！」

「院系合併後，宗派本位觀念應該被完全消滅了，黨可以不用擔心你們這些大圈圈中的小圈圈造反了。」

「舊的本位確是隨着調整被拆散了，但是新建立的宗派比舊的更堅固。從前教師學生之間的宗派是各別的，現在的宗派教師與學生是成了各種統一的陣線。長春大學的師生是三部份組成的：一部份是該校原有的學生，叫做東北派；華北的學校併進去的，叫做京派；我們南方併進去的，叫做海派。各派的學習遊息都各自劃成一個釐然的界限，像我們海派師生吃的十四萬元一月的小灶，東北人華北人吃的雜糧，我們怎樣吃得來。誰有錢誰拿出來用。東北籍的黨團員雖也常在飯廳裡用話筒叫大家打破地域觀念，不應再分派別，可是誰去理他們。本地和京派的學生總嫌華東的學生思想落後，華東的學生反譏他們是土包子。別說地域觀念，就是學業與思想上的分野，在東北也極顯著，學業與思想已成了反比的定例。愈是思想前進的，愈是對學科術科沒有興趣；對學科術科有興趣的，總是搞不通思想的。這跟黨尚潛伏在地下時期所吸引的青年恰恰相反，不知你有沒有注意這值得注意的現象？」？「你遭受的待遇還好吧？」？「這也不必說了。像我們這些教會學校或私立學校併進去的教師，是無法避免那不能容忍的歧視的命運的。好在照着調配的原則，我仍是拿原薪一千兩百個工薪分。東北的工薪分每分是二千零四十元，合起來有人民幣二百八十餘萬元，比起當地的教授要高出一倍，他們如何不眼熱呢？下學期可能不要我教書，留校學習」。

「這倒很舒服」。

「誰又知道明天呢！」

此外，作者剛剛接到「華東財經學院」任教的一個友人來信說：「開學已一個月了，我不知怎樣來編訂我的教學計劃。老的一套是用不通了，新的一套還沒有出來。組織上要我們充分地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我不懂俄文，教育部至今還沒有把蘇聯高等學校各種專業的教學計劃，教學大綱和教材翻譯出來。教書沒有教材，固是不能想像的事；我又不能督促學生用功，學生讀不好書却是我的責任」！

大陸的教授講師，普遍存在着上述那種消極徬徨的情緒。並且在苦難中違反良心說教。

第五節 被利用的學生

中共的教育是奴役教育，而其教育政策是：愚民的政治教育，和擰取的勞動教育，前者是手段，後者是目的。

政治教育的目的，要使中國人民盲從共產黨，迷信共產黨，迷信共產主義。不但使人有奴隸的思想，而且要有奴隸的靈魂。所以中共教育部副部長錢俊瑞說：「大學……的課程，必須繼續改革，改革的重點是增加革命的政治學習」。他們規定，任何科學的教學，一定要與實際相結合，也就是與政治相結合。茲根據「人民教育」三十一號，楊民華報告他在北平高等學校二科主持「精簡」課程的經驗。楊氏認為高等工業學校的教學計劃，以下列標準爲合宜：

① 政治教育課：約四〇〇小時，佔百分之一十。

② 普通科學課：高等數學、物理、化學等。

③ 普通技術課：約佔總時數百分之三十四。

④ 專業技術課：約佔總時數百分之二十八。

⑤ 俄文：必修三年。

六 毕業論文設計：十至十二週。

七 實習：十六至二十八週。

八 體育：一二年級必修，每週二小時。

九 假期：寒假二週，暑假六週。

這項工業學校的教學計劃，因中共自己缺乏材料與經驗，只得把蘇聯的五年制高等工業學校課程計劃，畧加減縮而成的高等工科學校的課程。至於文法學院、法律系、哲學系，已勒令停辦。政治、經濟、社會各系的課程，「精簡」以後，學生等於讀「馬列學院」了。文史各系「精簡」後，所添的是社會發展史，民間文學，托爾斯泰等。未被「精簡」的原有課程，也規定要用「新」的觀點、方法與態度來學習。也就是馬列主義的觀點與方法。^⑭

愚民的政治教育是手段，擰取的勞動教育才是他們的目的。他們要教育成所有的中國人民都心悅誠服的做奴隸，不但不敢反抗，而且要不願反抗。所以大力的提倡勞動教育，說「勞動創造了人身」。「勞動創造了人類世界」（恩格斯），中共負責文教的頭目更大聲疾呼的說：「實行真正理論與實際聯繫的方法，有效地培養大批高級建設人才」。紅色小學課本的主編人劉御，復為文闡揚勞動觀點說：

「我們穿的衣服，吃的五穀，住的房子，用的傢具，那一樣不是勞動創造出來的？可以設想：如果世界上沒有勞動，我們現在一定還過着茹毛飲血的生活，一定還停留在一般動物的階段」。

這種虛妄的說法，我們未遑加以批判。而其用心却是要使人像牛馬般的天天勞動生產、流血、流汗。共產黨的這種勞動教育，其目的不是在擰取人民的血汗嗎？

中共劫據大陸後，對於學生的奴役政策，大體是採取下列的五種方式：即控制、愚蔽、毒害、奴役、犧牲，以這五種方式交織結合，相互為用，其總目標就是奴役學生，強迫他們成為中共極權、賣國、侵畧政策的犧牲品。

中共對於大學生是五項方式全套應用^⑮，但是重點却放在奴役的政策上，因為大學生腦力，體力，技能都比較

成熟，可以訓練來作主要的宣傳工具，生產工具，迫害工具，統治工具。

從前所謂「百無一用是書生」，這句話在中共看來，簡直是太無知了。中共年來把學生當作寶貝般的利用。如利用學生宣傳的次數已算不清次數了，其中規模最大的一次是一九五〇年中共參加韓戰之後，出動全國學生來宣傳抗美援朝。據一九五一年一月一日「人民教育」二卷三期報導：「在首都、北大在一天裡就出動了一千九百餘人，達全校百分之九十四以上，從十一月八日到十九日共出動了二〇七次。清華大學動員二千七百餘人，首先在週圍十二里以內三十幾個村鎮宣傳，繼而把工作推動到近郊長辛店琉璃河豐台等工廠礦山……師大……在上海，復旦大學師生兩千多人……交大出動兩千多同學……其他重慶成都昆明錦州……」。

除了這種宣傳之外，還有示威遊行和參加文工團到處表演、勞軍、或要他們辦「夜校」、「冬學」。「湖北省立大治師範辦了八個夜校，由學生輪流去上課，每夜都要忙到十二點鐘才能結束，學生都感到精力不足，健康很受影響。」（見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三日人民日報）。

中共把學生當作生產工具的情形怎樣？在這裡我們也舉一些實例，最顯著的便是治淮。「嶺南大學部份師生組成修治淮河工作隊，北上參加工作，預計工作到明年七月回校」（見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一日香港大公報）；「南昌大學土木系四五年級及水利系學生參加治淮」（見一九五一年十月三十日重慶大公報）；「華東區大學及專修科學生約五百人參加治淮」（見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大公報）；「中央音樂學院有一百〇八人參加治淮」（見一九五二年六月三日長江日報）。

學生除了參加治淮的勞役之外，還有參加荊江分洪工程的，例如「廣州天佑高級工業學校全體貞生三百多人於四月中旬北上參加荊江分洪工程」。（見一九五二年五月十日廣州南方日報）。

中共利用學生作迫害工具的情形又怎樣？三年多來無論是「土改」，「鎮壓反革命」，以及「三反」，「五反」，學生被迫去當特務，檢舉親友，監視師長，威嚇商人，查賬，盤問，佈置圈套，由城市到鄉村都有學生的足

跡。「湖南大學一九五一年十一月間，學校行政即作出決定，號召全校師生員工參加土地改革；開始時反應是不一致的，堅決響應的只有一部份。願意參加的同學動機也是很複雜的，有的只是想去看看場面，有的想當當幹部，顯顯威風，有的又是爲了怕別人笑他落後才表示願參加的。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起學校領導開展了全校性的關於土改的學習！十二月二十九日舉行土改幹部報名登記。教師中百分之八十都報了名，職員們報名的是全部，批准了百分之七十五，同學們差不多百分之百報了名……師生共有二千二百餘人，日內即編隊出發」（見一九五二年一月九日長江日報）。從這土改的報導，我們知道學生們最初的反應是不一致的，但到了後來，亦即是參加土改的學習以後，同學們都決定參加了。其間自然是威迫利誘使得他們只好唯命是聽了。

還有中共利用學生作統治工作的情形又怎樣？¹⁶這本來是中共對待學生的基本正常安排。這裡所說的統治工作是廣義的說法，包括中共統治者所需要做的政治、財經、文教、社會、黨務、特務各方面的工作。中共據據大陸的時候就開始大量徵調學生作幹部。一九四九年華北學生組成的「南下工作團」，華東學生組成的「西南工作團」，對中共的接管工作發生了極重要的功用。它統治全國之後，需要幹部數量越來越多，一方面大量設立「大學」名義的短期幹部訓練班，如華北人民革命大學，華東人民革命大學，中原大學，南方大學等，一面把正規學校的學生大批抽調離校，並且變象地縮短學程，把大學三四年級的學生提前畢業，送去作統治的工具。

茲把中共利用學生爲統治工具，以遂其屠殺異己「鎮壓反動」政策之又一事實，佈露如下：

據今年（一九五四）五月十日北平新華社訊：中共高等教育部於最近召開「全國政法教育會議」，討論配合「國家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政治教育工作任務與方針，該會議規定：「在國家過渡時期的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務是進一步健全人民民主制度，加強和運用人民民主治制，鞏固人民民主專政。以保障國家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各種社會主義改造事業的順利進行。」該會指出中共今後政治教育的方針是「有計劃按比例地培養忠於社會主義」「具有堅定的工人階級立場和社會主義政治觀點，掌握先進（按指蘇俄）政法科學」的「工作幹部和科學家」。這個方針說

明：中共要加強「俄化」，鞏固專政，正在設法強化它的「法制」，並訓練一批忠心的鷹犬和爪牙，以便於進一步的鎮壓人民的反抗。

該會並規定了今後中共政治教育的工作任務是：

一、「第一步貫澈理論與實際相接合，學習蘇聯先進經驗與中國實驗情況相接合。」

二、「在今後二三年內將縣（市）以上各級政法部門的骨幹和領導幹部輪訓一遍。」

三、「政法院校的畢業生將參加階級鬥爭最前列的工作」。

四、「各綜合大學法律系和政法學院本科，應多招收工農幹部和在職幹部，也應招收政治質量較好的青年學生，培養他們成為政治建設中的骨幹。——」

五、「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內，全國政法院系計劃招生一萬名。」

六、「集中力量將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北京大學法律系和北京政法學院辦好。」

會議認為「政法教育的教學改革工作，比其他系科更為迫切和必要。」所謂改革，就是：「一切舊法觀點，必須澈底批判。」

為執行此一任務，中共必須澈底肅清「舊法觀點」，在「新民主主義」時期暫時留用之舊司法人員將全被整肅，代之以「工農幹部」。所謂「政法院校的畢業生將參加階級鬥爭最前列的工作，」亦即中共政法工作澈底特務化之謂。在此「總路線」「過渡」階段，整個大陸又必有一番大屠殺。

再有中共強迫學生參軍參幹，和到部隊中作政治工作，宣教工作的情形又怎樣？^⑯中共發動學生參軍，到現在為止，有三次大規模的運動。第一次為一九四九年共軍從東北南下的時候，第二次為一九五〇年底，中共剛參加韓戰的時候，第三次為一九五一年中，中共在韓戰軍事慘敗的時候。每次運動被拉被迫的學生都是數以萬計，尤其第三次更是空前龐大。據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四日人民日報透露，全國各地學生那一次已有五十餘萬人踴躍報名參加

軍事幹部學校。

中共在韓戰場依然是用人海戰術，對抗猛烈的火海，幾個回合的結果是傷亡慘重，這些惡訊，很快地流傳到大陸的各階層，敏感的學生一聞參軍都有淡虎色變和恐懼的情緒。中共鑑於一般學生不願「參軍」，故於一九五二年春，發動了「參幹」運動。那一般玩弄宣傳技倆的幹部，便大肆宣傳。如：建設國防軍，必須建立國防幹部，而國防幹部只有青年學生才合標準。這樣一來，觸動了一部份學生想當官的動機，因此，上了它的釣鉤，紛紛的簽名「參幹」了，結果中共總算達到了理想，又騙取了四十六萬學生入伍！

這幾十萬天真而且存有升官幻想的學生，除掉一部份青年團員被分別送到各兵科軍事學校受訓外，大多數的人被分批的送到東北，有的受了短期訓練後送上戰場，有的連火車都沒有落就被送上前線！

中共爲着掩飾自己的騙術，對學生解釋說：「共產黨的練兵是在戰場上練的，經過幾次大的戰役，學會了人民解放軍的作戰，就算軍訓畢業了，經得起作戰的考驗，就可以充當一員幹部；經不起戰爭的考驗，共產黨是不可能給他幹部當的」。經過這一番解釋後，一羣「參幹」的學生們，才澈底覺悟，明白受了魔鬼的欺騙，但在異國的前綫，想冒險逃出魔掌，是根本不可能的，唯有仰天長嘆，任死神擺佈了。所謂「藝高人胆大」，這一羣學生，連槍都不會放，根本無藝可言，當然胆量是小的，在猛烈的炮火下，缺乏戰場經驗，只有做槍口下的冤鬼！如此練兵，如此考驗，實是曠古未有的慘劇！^⑯

中共強迫學生作政治工作，宣教工作，實在是普遍與常見的事。例如歡迎蘇聯老大哥貴賓的時候，總要弄幾個漂亮的女學生去向國際友人獻花擁抱；開招待會的時候，總要弄學生表演節目，「以娛嘉賓」。有時學生也被迫去「娛」中共幹部。例如一九五一年八月十四日長江日報報導：「學生組成的樂隊，也隨時爲各機關團體借用，他們口口聲聲『抗美援朝』，不借就給你戴一頂大帽子。有一次文教局文工團要我校樂隊參加演出，一去就是十二個晚上，還有十五個下午是演習。這些參加樂隊的學生疲勞不堪，也很不滿意說：『我們不是職業樂隊』。」又如「人

民教育」三卷四期上說：「各方面動員學生做各種臨時工作：開會佈置會場，作招待、記錄、宣傳種痘、調查戶籍、徵糧、收稅、動員獻花等，有的誤課十天半月乃至一月，有些機關、團體在學校中通過其垂直系統，直接佈置工作，召開會議。如五月三十日蘇南日報一個通訊員反映：無錫一個學校有百分之十五的學生被邀參加了市區派出所工作，擔任的有治安組長、居民小組長、讀報組長、冬防服務組長、文娛組長、俱樂部主任、宣傳委員等、有的身兼二職或三職。該通訊員反映這些同學『事情很忙，身體吃不消』。」

中共對待學生一整套的辦法是：犧牲學生的青春、健康、心智、自由、求學的機會，進一步犧牲學生的性命。中共把學生在校的時間由領導上佈置下全部安排好，使學生們永遠做不完，而又不得不做的工作，和不得不開的會。使學生都是掛名讀書。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三日上海「解放日報」有下列一段的記載。這是學生苦悶、憤恨之餘，大膽地寫信給「解放日報」反映出來的：

「祖國急切地期待高等學校培養出建設人材，而我最近在復旦大學却看到了這樣的情形；一位生物系的同學，是共產黨員，又是支部組織委員，這次考試七門功課有兩門不及格，化學五十一分，物理四十一分；物理系一年級一位同學是青年團員，這次考試成績也很壞，物理不及格，數學只得十八分。他們應該在學習上起模範作用的。為什麼成績如此之壞呢？同學不用功學習嗎？教師不努力教嗎？一般說來都不是。……生物系的那位同學，從開學到現在，她所參加的大會、小會、討論會、報告會、多得難以統計。她白天開會，晚上開會，甚至深夜也開會，她休息時間開會，自修時間開會，甚至上課的時間開會。五次化學習題，她只做了一次，三次物理習題，一次也沒有做。她身體累得生病，經常打針吃藥。她是知道好好學習，但是領導上佈置下來的工作不得不做，會不得不開。物理系那位同學，本來學業基礎比較差，但是會議，活動總是佔據了她課堂學習和規定自修以外的全部時間，新的功課教下來了，她前面的功課還沒有複習好；拿起書本，心思又分到工作，活動上去了。……她成月的沒有時間洗澡，星期日當然也難得休息了。她和許多同學一樣，經常負着兩種沉重的

『債務』。一種是『習題債』，前面的習題還沒有做好，後面的又下來了。越積越多，越積越重；一種是『睡覺債』，她經常缺少睡眠，上第四課時就要打瞌睡了。』

中共不特把學生在校的時間全部加以控制，且把學生當作馬牛般的磨折，使其身心疲困，精神紛亂不安，簡言之便是養成學生意志消沈可以任其役使奴隸，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三日上海「解放日報」另一記載，是反映中共磨折學生的絕好說明，原文如次：

「從十二月初開始，課都排到上午去了，名義上是爲了集中課外時間，……讓同學自習，但事實上是增加了與課程無關係或關係很少的活動。政治輔導處，青年科，學生會，團支部，班委會，學生會宣傳部，……時常不加考慮，互不通氣的各自決定開會，如果每個組織每週開會一次，一週中的大會，小會就可以排得密密層層。……弄得許多同學說：『這不是叫我們抓緊時間完成祖國交給我們的學習任務，而是硬要浪費我們的時間』。同學們反映：『以前整天有課，課間難以集中時間開會，自修時間還多一些，現在下午不是這個會，就是那個會，根本無法控制時間自慘，心緒不寧』。……開會的時間又沒有統一的規定，隨便那個組織系統，想開什麼會就開什麼會，想什麼時間開就什麼時間開。由是下課後休息的十分鐘要開，文娛體育活動的時間要開，一放下飯碗就開，有時星期日也要開，晚上十時熄燈後還是要開，嚴重地妨礙了同學們的學習和健康。』中共利用學生作種種的工具，並巧立各種名目控制學生的作息時間，其用心如何？毋待贅述。由於它奴役學生過多，加以大陸普遍貧窮，營養不足，患肺病的學生，已經是駭人聽聞了。據「人民教育」一卷三期公開承認：

「大學生的健康問題據幾所大學的健康調查，肺病學生佔十分之一，這是極可怕的事實。」按照這種嚴重的情形，醫療又復缺乏，蔓延滋長，勢將與日俱增，然而中共會注意嗎？會停止向學生奴役壓迫嗎？那真是休想！

現在大陸所有的大學，專門學院幾完全作了中共黨團的天下，到處一片忙亂，早已不成其爲讀書，而是成天團

團轉地鬼混。這些學生們成天在忙些什麼？一九五三年四月十五日香港自由人報，有一篇綜合的報導，最為真切翔實：

「大陸青年學生們究竟成天在忙些什麼？這裡，我們為節省篇幅，特綜合大陸各地報紙對各地學校提出檢討的內容加以扼要地介紹。」

忙於開會：其會議之多，實堪令人咋舌！據統計：在每一學校中都有黨團大會委員會，小組會，學習會，報告會，檢討會，總結會，評論會，傳達會，友好會，慶祝會，座談會，紀念會等等（名目繁多，不勝枚舉）總共有四十八種會議之多！因而論時間：白天開會，晚間開會，下課開會，休息開會，平時開會，假日也開會，甚至半夜及上課時間都要開會！論空間：禮堂裡開會，教室裡開會，飯廳裡開會，操場裡開會，寢室裡開會，甚至走廊，屋角裡也在開會！論內容：為了政治，學習，批評，檢討，傳達等固然要開會，即小得為添一枝，一把刀等等芝麻綠豆的事也要開會！

忙於職務：就是因為各學校中的會議及組織太多，於是學生的職務也多得可怕了。各學校中的組織除黨團委員會及其各股各組外，其他什麼學習委員會，評議委員會，考核委員會，愛國公約推動委員會等等就有二十二個之多，而且各會都有各會的什麼主席啦，委員啦，股長啦，組織啦，多得不可勝計，因此差不多每一個學生都身兼三五職以上，乃至有多至十餘職者。即以重慶土木建築學院為例：在一個只有二十一人的班級裡，就有交大家分擔的職務九十八個之多。亦因此，這些學生僅為這些職務奔波，就已忙得透不過氣來了。

忙於運動：誰不參加會議及不參加服務而鑽研功課，誰就是『個人主義』，於是便來一個『反個人主義運動』。誰要如功課成績好了，誰就是『風頭主義』，於是便要來一個『反風頭主義運動』。誰要如政治活動不够積極，誰就犯了『不良傾向』，於是便要來一個『反不良傾向運動』。誰要如對組長，股長，委員，或主席領導，質問等等表示一點不耐煩時，誰就被認為『不禮貌』，或『冒犯領導』而誰就犯了『無組織無紀律』的

行爲，於是便要來一個『反無組織無紀律運動』。諸如此類，亦多得不可勝計。如此胡鬧，那還有不忙之理。

忙於打瞌睡：學生們既忙得半夜裡或上課時間，都常常在開會或搞什麼活動，那末當然睡眠時間根本就不足了。可是另一方面：加上學校教學和黨團活動根本是兩種相衝突的事情，儘管黨團方面活動如此猖狂，學校教學方面還是照樣有上課及小考等等實施，學生們依舊不得不敷衍功課。黨團活動已這樣忙，大家便不得不以開夜車來補救功課，或應付考試，結果，當然睡眠更覺不足了。於是誰都免要在白天到處東倒西歪地打起瞌睡來。尤其在上課時間身心一靜，幾乎十九都在矇矓之中，十九都在爲打瞌睡而忙了！

準此，便可知現在大陸的青年學生們究竟成天在忙些什麼？也可知現在大陸，所謂讀書，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了。而它教育的目的，誰說不是奴民愚民呢？

①參閱中共新華書店出版：「穩步改革高等教育」

②參閱朱伯耆著：「大陸學府新面目」中的「課改奇觀」及王祖恩著：中共奴役下之大學教育。

③參閱岳威著：「奴化的共區中學教育」第二十頁至三十頁

④參閱祖國十二期：「學習俄文運動在大陸」，中國之聲六卷十一期：「全盤俄化的清華大學」

⑤參閱中國之聲七卷一期：「大陸教育的剖視」

⑥參閱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七日香港星島日報「北京公佈工學院系方案」

⑦參閱文教參考資料：關於西南區文教工作的報告

⑧參閱鍾石著：「不是教育的教育」

⑨參閱黃鞞著：中共改造思想運動的內幕因果；及石雲著：知識份子的空前厄運。

⑩參閱朱伯耆著：「大陸學人浩劫」七一一七四頁

⑪ 參閱朱伯耆著：「大陸學人浩劫」八八——九一頁

⑫ 參閱朱伯耆著：「大陸學人浩劫」九一——九四頁

⑬ 參閱楊力著：中共怎樣對待教師；任仲時著：反對毛澤東剝奪人類思想自由

⑭ 參閱高健行著：「中共的奴役教育」第十七頁至二十八頁

⑮ 參閱吳惠民著：「中共怎樣對待學生」第四七頁

⑯ 參閱吳惠民著：「中兵怎樣對待學生」第四十二頁

⑰ 參閱吳惠民著：「中共怎樣對待學生」第四十六頁

⑱ 參閱陸心泉著：「大陸學生在苦難中掙扎」（見自由陣線十三卷十期）

第四章 中等教育

中共的整套教育理論，是主張文化教育爲政治而服務，中等教育自亦不能例外。不過，中等教育是常識教育，實施這種教育的機構普通分爲兩類：一類是以升學爲主要目標的準備教育，就是普通中學，另一類是以就業爲主要目標的職業教育，就是各類職業學校或師範學校等。

中共怎樣把政治思想結合到中等學校各學科去，以達到它寓政治思想於文化教育的裡面，奴役中國的人民。它奄有大陸之初，因爲社會秩序未復，到處呈現混亂的狀態。其於中等教育，首重恢復與維持，在課程方面僅取消了原有的公民課，代之以政治課。童子軍和軍事訓練也在「反動」課程的名義下被「精簡」了。當時政治教育與文化教育所佔的比重和分量，是按照不同的對象而決定的。對於成人以教育和實際生活工作的教育爲主；對於青年兒童暫以文化教育爲主；幹部教育方面，則以實現所需的知識而定，一般地說，在職幹部以思想政治教育爲主；老一點的幹部，逐漸增加「業務」，「政策」，「文化」，「科學」教育，對於中學生，則以「政治思想」與「文化科學」兩者同時並重。普通中等學校，政治課約佔百分之十，「新解放區」有時增加到百分之十五。實際上國文、歷史等課已變成純粹的政治課。政治課是以原編公民課的時間講授，政治教師由文教廳（局）指派，私立學校由校長選荐，呈請文教廳（局）核准任用。

目前中共對中等教育的揭櫧是：「整頓和積極發展中等技術學校，大量培養中級技術幹部。」一九五一年三月全國中等教育會議，決定了中等教育方針，任務，普通中學宗旨目標，教學計劃，及課程標準，並另製定了中學暫行規程。按照中學暫行規程規定：「首先在各地區選擇條件較好的中學二百五十所切實執行取得經驗逐步推廣，對

私立中學。則積極領導加以改革。」這是中共對中等教育大致處理的情形。

我們從一九五一年八月十日中共政務院通過的關於改革學制的決定，其中有關中等教育方面，首先決定中等教育的類別。實施中等教育的學校為各種中等學校，即中學，工農速成中學，業餘中學和中等專業學校，中學，工農速成中學和業餘中學應給學生以全面的普通的文化知識教育；中等專業學校按照國家建設教育，實施各類中等的專業教育。

甲、中學：中學的修業年限為六年，分高初二級，修業年限各為三年，均得單獨設立。教學內容採取一貫制的精神，同時照顧到分段的需要。

初級中學，招收小學畢業生或具有同等學力者，入學年齡以十二足歲為標準，畢業後得經過考試升入高級中學或其他同等的中等專業學校。

高級中學，招收初級中學畢業生或具有同等學力者，入學年齡以十五足歲為標準；畢業後，得經過考試升入各種高等學校。

初級和高級中學的畢業生之不升學者，應在政府指導之下就業。

乙、工農速成中學：工農速成中學修業年限為三至四年，招收參加革命和生產工作達規定年限並具有相當於小學畢業程度的工農幹部和產業工人，施以相當於中學程度的教育，畢業後，得經過考試升入各種高等學校。按工農速成中學，其施教目標，與普通中學並無區別，唯其所招收的學生是由各部隊、機關、工廠、學校抽調與選送的工農青年及工農幹部。也就是他們所稱的領導階級。這些學生須合乎下列的條件：

（一）參加革命鬥爭三年以上，且有相當於高小畢業程度，年在十六歲至卅歲，思想進步，身體健康，工作積極的部隊，機關工作人員。

（二）有三年以上的工齡，年在十六歲至二十八歲，具有相當於高小畢業程度，思想進步，工作積極，身體健康

的工人，首先着重產業工人。

設置的辦法有一：

（一）專設的工農中學，由部隊與機關工廠等舉辦，其辦法：

- A. 抽調上述工作人員與工人，完全脫離工作與生產，進入專設的工農中學學習。
- B. 先辦好業餘學校或半日學校，使其與正規學校銜接配合，然後有重點的加以提高與加強、逐步辦好專設的工農速成中學。

（二）附設於指定的大學、專科學校、普通中學或師範學校內，但須有獨立的機構，計劃與制度。

經費由中央統一籌劃者，由中央撥發，在中央計劃之外由各地舉辦者，由各地自籌。部隊機關舉辦者，由部隊機關統一籌劃，學生的待遇參照軍公人員，一律「供給制」。

丙、業餘中學：業餘中學分初、高兩級，修業年限各為三年至四年，均得單獨設立，分別招收業餘初等學校或業餘初級中學的畢業生，或具有同等學力者，施以相當於初級中學或高級中學程度的業餘教育。入學年齡不作統一規定。

業餘初級中學的畢業生，得經過考試升入高級中學，業餘高級中學或同等的中等專業學校；業餘高級中學的畢業生，得經過考試升入各高等學校。

丁、中等專業學校：

①技術學校（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技術學校修業年限，二年至四年，招收初級中學畢業生或具有同等學力者，入學年齡不作統一規定。

初級技術學校，修業年限為二年至四年，招收小學畢業生或具有同等學力者，入學年齡不作統一規定。初級技術學校和技術學校的畢業生，應在生產部門服務；在服務規定滿年限後，得經過考試分別升入技術學

校，高級中學或各種高等學校。各類技術學校得附設短期技術訓練班或技術補習班。

- (2) 師範學校：師範學校，修業年限為三年，招收初級中學畢業生或具有同等學力者，入學年齡不作統一規定。

初級師範學校，修業年限為三至四年。招收小學畢業生或具有同等學力者，入學年齡不作統一規定。師範學校和初級師範學校均得附設師範速成班，修業一年，招收初級中學畢業生或具有同等學力者；並得附設小學教師進修班吸收在職小學教師加以訓練。

幼兒師範學校，修業年限和招生條件相當於師範學校，師範學校和初級師範學校均得設幼兒師範科。

初級師範學校、師範學校和幼兒師範學校的畢業生，應在小學或幼兒園服務；在服務滿規定年限後，得經過考

試，分別升入師範學校、高級中學、師範學院或其他高等學校。
(3) 醫藥及其他中等專業學校（貿易、銀行、合作、藝術等），其修業年限，招生條件，參照技術學校之規定。

據中共中學規程修正草案稱，中學教育目標有四：

- 「(1) 使學生能正確運用語文工具，掌握現代科學知識與技能，養成科學的世界觀。
(2) 實施革命的，愛國主義的政治思想教育，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思想，養成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護公共財物的國民公德和堅毅勇敢自覺遵守紀律的精神。
(3) 培養學生體育衛生的習慣，以養成健全的體格。
(4) 陶冶學生的審美情操，並啟發其藝術的創造力。」

從前述的學制，可知在中等教育方面，大體上是保持着原有的體制。最顯著的普通中學仍是三三制，師範學校亦仍沿舊制。不過它為了鞏固它的霸權，維持不敗的優越地位，特別為他們的「工作人員」和工農幹部，提高文化

科學水平、添辦了工農中學、和業餘中學。至於專業技術學校純粹是爲了培養中下級的工奴，殊不足道。

爲研究高深學術作準備的中學教育制度，從一九五〇年下半年起，有一個明顯的趨勢，就是取銷原有的普通中學，並限制其發展，另一方面則以全力發展工農速成中學，和二部制中學。但其目的嚴格言之，仍然沒有脫離準備教育的功能。

中共的中學教育目標沒有智育、德育、體育、美育的全面發展，而只是小學教育的延長和加深，準備教育的功能並不顯著。固然中學教育的主要任務是從事高深學術研究的準備。但中學畢業生不能全部升學，勢必有大部份從事職業，爲多年來的客觀事實。據中共發表的數字，一九五二年全國有中學生二、三三五、九六一人，高等學校學生二一九，七五〇人，相差在十倍以上。如果中學生完全脫離了職業準備的教育，對社會將是怎樣巨大的災害，當不難想像。在現階段的中國中學教育，實不能沒有職業訓練的成份。中共悍然不顧，這也許是奴役教育的特點。^①

第一節 一般情形

中共對於各級學校的政策，原則上是一致的。不過政策的重點稍有不同而已。譬如對大學生重點是放在奴役政策上；中學生的重點是在犧牲；小學生的重點是在毒害。又如對於教師，最初是重視，他們說：「人民教師是新中國兒童青年的靈魂工程師，是中國工人階級所藉以實現其對國家領導的極其重要的助手」^②。接着是利用和改造教師，爲了要利用教師訓練青年學生無條件服從中共，盲目地崇拜俄共，瘋狂地反美，仇美成爲他們的奴隸、打手。不能不先要使教師，成爲「奴師」。所以錢俊瑞在「高等教育改革的關鍵」一文裡，高叫「這次學習運動的目的是改造教師思想。……我們究竟應該用什麼作爲武器來改造教師們的思想呢？應該用工人階級先進份子的思想，也就是說，應該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又說「我們這次學習運動應該用馬克思主義

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用革命的愛國主義、國際主義和集體主義，用工人階級的理論與實際一致的基本觀點，來堅決地肅清……英美反動資產階級的思想影響，克服個人主義、客觀主義、宗派主義和教條主義的錯誤思想和作風」。明白言之，就是要教們先把幾十年學養所結晶的思想拋棄，違背良心和理性去信奉馬恩列史毛的思想。誠懇地表示接受、和擁護，否定自己的一切，惡毒地痛罵自己。達到控制教師的終極目的。

中共對於中等教育，最初的态度是：「加強領導，逐漸改造」，接着又規定「管理辦法」。進行調查登記，指派政治教師，這樣便把原有的私立中學，加上了重重的鎖鍊，成爲它予取予奪的囊中物了。例如：管理私校的第三項辦法：「校長如不能執行政府方針或不稱職時，文教廳局得令董事會另行委派，而董事會委派之校長，須呈請文教廳局批准後，方得就任，必要時文教廳局得直接委派校長。」像這些規定，一切私校與公校性質已相差無幾了。過去的許多私校在中共看來，十之八九都是反動的，一旦時機成熟，中共便給予種種困難和打擊，迫使他們自動辭職，另行直接委派校長或整理委員。

據中共的供述，這些年來接管停辦的中等學校計有：

上海市二百十餘所私校中，接管的三十二所，停辦的四十五所。^③

廣州市接管的文教機關有四十二個單位，其中學校佔百分之六十，條件不够撤銷歸併的中學有二十三所。^④

武漢市「解放」前有中學二十七所，「解放」後減少壽昌武漢兩所。^⑤

綏遠省一、二、三，中學合併爲歸綏中學；正心中學、包頭師範合併爲包頭中學；私立綏西聯立中學併入爲省

立陝壩中學；狼山中學併入省立米倉農科職業學校；河套中學併入省立五原中學。^⑥

廣西省「解放」前有中學校二百三十八間，至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僅恢復了一九〇間，計未恢復者四十八間。^⑦

北平市停辦的中學，計有維新世熙二中學；接管的有新青年女中；合併的有近智中學、民國中學；以上二校合併後改名爲新中中學；求實中學、進德中學合併。並改名爲新知中學；奮鬥中學遷往綏遠；燕山中學併入國民學